

# 顾实学术方法及其在文献学上的成就

朱新林\*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本文认为顾实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注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并将其运用到读书治学中, 取得了令人敬佩的学术成就。在具体的学术方法上运用上又强调文献学的基础功底。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 顾实; 学术方法; 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3-0087-05

顾实(1878-1956), 字惕生, 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 古文字学家。早年攻习法科, 曾在东南大学执教。后在无锡国专任教, 教授中古文学。通多国语言, “读日本书, 犹本国书也。习英法德三国文字, 粗能检读。”<sup>①</sup>喜研先秦史籍, 又理西方学术, “究心于古今地理沿革, 其后习东西洋史, 又探究西北地理。”<sup>②</sup>其著述兼涉史、子、集三部, 主要著述有《汉书艺文志讲疏》、《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墨子·辨经讲疏》、《庄子天下篇讲疏》、《大学郑注讲疏》、《中庸郑注讲疏》、《论语讲疏》、《杨朱哲学》、《中国文字学》、《说文解字部首讲疏》、《六书解诂及其释例》、《重订古今伪书考》、《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但“刊者十不盈一, 盖慎之也”。与丁福保、王献唐、马叙伦、徐宗泽、瞿良士、瞿凤起、张元济等人交往很多, 在学问上互相切磋, 相得益彰。

## 一

顾实注重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先秦典籍, 凡作著述, 都将其放在当时学术史的大背景下予以宏观把握。他在《汉书艺文志讲疏自序》(以下简称《汉志讲疏》)中说:“夫中国古史蒙昧, 曩尝欲撰上古史, 而征信于先秦群籍, 寻其自然之证迹。”<sup>③</sup>在其《汉志讲疏》自序中, 从三皇五帝开始述起, 将中国上古至先秦的学术之源流发展叙述清楚, 而后将《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引出, 凸显《汉志》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 “而试一审《汉书艺文志讲疏》, 则今古之传, 犁然秩然”。<sup>④</sup>在这里, 顾实不仅将《汉志》看成是一部目录学著作, 更重要的是将其视作一部较早的学术史著作。他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自序》(以下简称《穆传讲疏》)中说:“慨上古史之多阙, 而注意于《山海经》、《穆天子传》二书多所考证”<sup>⑤</sup>, 认为“得《穆传》以治上古史, 则可以为一一切上古史之原料也, 中华上古史之原料也, 世界上古史之原料也。乃至专门学术史, 如上古之法治也, 交通也, 民族变迁也, 文化移动也, 皆当以此《穆传》为之原料也”<sup>⑥</sup>, 其所重学术源流如此。顾实之所以注重学术史的审视, 是由于他认为从学术史源头上把握典籍, 可以“本正而末自理”。这种对学术史的宏观把握使其具备了良好的学术史素养, 从而使其在治学时游刃有余, 轻车熟路。

纵观其著述, 大都为先秦典籍, 这种对先秦典籍的爬梳剖析也正体现了他对学术源头的强调。有了学术史的宏观把握之后, 才有了对某种思想和某部书的较合适的定位。在对典籍进行定位以后, 顾实利用其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文字、音韵、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运用, 寓宏观于微观之中。在其引用书目中经部如《尚书》、《左传》、《礼记》、《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 史部如《史记》、《汉书》、《后汉

收稿日期: 2005-07-20

作者简介: 朱新林(1980-), 男, 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 文献学理论和先秦两汉学术史。

①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第9页, 民国丛书本第三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1933年版。

②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自序》第2页, 民国丛书本第三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1933年版。

③ 《汉书艺文志讲疏自序》第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④ 同上。

⑤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自序》第1页, 民国丛书本第三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1933年版。

⑥ 同上。

书》等，子部如《荀子》、《庄子》、《韩非子》、《墨子》、《论衡》等，材料广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汉志讲疏》中，对各序的讲疏条分缕析，材料广博，内容翔实，对每一古书的讲疏分别标明存、残、亡等，讲明其传本源流，列出其主要版本，而后可知某门之发展源流，甚得家法。在具体的讲疏中，通过其对文字、音韵等知识的具体运用实现了对典籍的宏观把握。在对每一条目梳理时，皆有理有据，广征博引，综合前人说法，予以断语。古人对同一问题的见解一一列出，并提出己见。《汉志·六艺略·礼》有“记百三十一篇”，《六艺论》认为戴记后起礼家所集，而兼糅和古文逸经。顾实认为《戴记》为古文，证据有二。“司马迁以《五帝德》、《帝系姓》为古文，而《大戴礼》有之，其证一”<sup>①</sup>，又，“《礼古经》出鲁淹中，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而《小戴记》之《月令》、《明堂位》，《别录》属《明堂阴阳》，其证二”<sup>②</sup>。又引用《后汉书·桥玄传》驳斥了《隋志》言马融于《小戴》增益三篇之谬，又驳斥了《隋志》中所引晋陈劭所谓二戴互删之说。接着将大、小戴《记》的篇数源流叙明，将诸家说法一一列举，如引钱大昕说法：“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sup>③</sup>，但陈寿祺、邵懿辰、黄以周、皮锡瑞均反对此说，顾实同意钱大昕的说法，认为陈寿祺等人未进行仔细考辨。顾实还认为汉代时《尔雅》在《礼》中，其证有三，一是《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二年《传注》引《礼》“天子造舟”四句，孔颖达疏认为出自《释水》；二是《白虎通·三纲六纪》篇引《释亲》，为《礼亲属记》，《风俗通·声音篇》引《释乐》，为《礼乐记》；三是赵岐《孟子注》中“馆甥”引妻父曰外舅两语。其说可通。最后将《别录》所称“古文记二百四篇”的说法一一梳理，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据汉代所得到的古文《记》而言的，即《记》一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一共二百一十五篇，除去一百三十一篇中已经有的《乐记》二十二篇，正好为二百零四篇。《隋志》又有二百一十四篇之说，顾实认为这是刘向校书以后的说法。刘向《别录》没有著录《礼记·丧服四制》（孔疏说法），因此《记》为一百三十一篇，再加上《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正合二百一十四篇之数。最后列出《礼记》的通行本，即《四库》著录的《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孔广森、汪照的《大戴记补注》，王聘珍的《大戴记解诂》。正文仅“记百三十一篇”六字，而其讲疏至千余言，将《礼记》学术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诸如《记》今古文，马融增益三篇，二戴互删，大小戴《记》篇数等问题，通过援引诸家和考证的方法一一叙明，给人以学术史的直感，由此体现出顾实善于驾驭材料，把握宏观问题的能力。

在其《中庸郑注讲疏》中，顾实注重阐发其中义理，兼训文字。其大部分遵从郑注，不同意郑注的则提出己见，并加以证明。在《穆传》的讲疏中，他依据此书的特殊性，不再强调从文字、音韵上予以梳理，而着重从历法和地理两方面对其讲解。以历法立论，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自当为周书。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顾实持论极为坚实。又以地理之学确定周穆王所达地域为欧洲大平原，对穆天子西征路线进行“疏通证明”，将其路线一一考订，尽管这种观点现在还不能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他能够冲决传统意识的束缚，大胆在域外远寻穆王辙迹的思路，与刘师培“不得泥博望以前西域未通之说也”的见解一致，这种认真探索，有益于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在《穆传讲疏》中他将某一地方的变迁过程一一排比，同时参引诸家说，以作辨析。在这方面可见其地方志之功底。在赞同别人的观点时，也不盲从权威，如不同意必提出己见加以证明。

在微观把握上极为严谨，自称“绝不作游骑无归之谈”<sup>④</sup>，在《穆传讲疏》中称“字栞句比而求之，爬梳剔刮，无微不至。”<sup>⑤</sup>对于尚缺乏证据的，则以存疑对待，以俟后学，不敢轻下妄语。在《穆志讲疏》中，其“最感痛苦者，河套北岸诸山也”<sup>⑥</sup>，当时《清一统志》、《百万分之一中国舆地图》资料均不详，而《蒙古志》、《蒙古鉴》二书，又抄撮而成，不足考核，因此他认为自己对河套北岸诸山之考“虽悉心钩稽，粗足证古而已”<sup>⑦</sup>，同时“深愿今后之河套南北，有精密实测而能贯通古今之地图地志也。”<sup>⑧</sup>其谨严如此。

## 二

顾实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早年服膺顾亭林、顾祖禹，兼泛滥于宋明儒书，不久又酷嗜许、郑之学，仔细研读了《皇清经解》正续编。他的这种治学历程使其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但他又不因循守旧，善

① 《汉书艺文志讲疏》第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版。

② 同上。

③ 《汉书艺文志讲疏》第44页。

④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例言》第6页。

⑤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自序》第2页。

⑥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例言》第9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

于利用外来文化，为我所用。他将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横向的外来思想相结合，使得其著述观点更有可观。顾实为民国时人，此时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已渐入人心，“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一时风尚，顾氏也不例外，其思想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这种烙印不是一味的盲从西方，而是将传统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使其观点更加新颖，观察问题独具慧眼。即一方面直承了乾嘉学风，注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进行考证，以资立论；另一方面又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

在继承乾嘉学风方面，他认为治学最要紧的是一字要诀，“曰如，如其原来而不加穿凿”<sup>①</sup>。同时认为凡古书皆有时代性，即在了解其一时代之用语，反对妄事推测。强调以经解经，不穿凿附会，以事实为根据。如其在《大学郑注讲疏》中主张“以大学解大学”，认为《大学》中所说“物有本末”之物，与“格物”之物，非有二物；“物有本末”之物与“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之“本末”，亦同一“本末”，非二本末，这便是大学解大学者，以姬汉书还姬汉书也。反对添字解经，妄加推测，反对朱熹将“大学”释为“大人之学”，顾实认为此等做法为添字解经。认为如果此种习气不改，则“蒙蒙若未视之狗”。他认为“夫大学一语，犹今言大学校也，集中天下人才于中央。”<sup>②</sup>

顾实又认为读书治学要有“逻辑”，注重明学问之先后次第。在《大学郑注讲疏》中，认为《中庸》一书是“用归纳式之方法，组成全书。”在对《大学郑注》进行疏解中，将其分为八章：“一曰大道，二曰格物，三曰致知，四曰诚意，五曰正心，六曰修身，七曰齐家，八曰治国。而平天下章则无有也，盖平天下者，与明明德于天下之变词也。”<sup>③</sup>同时认为《大学》中“格物”，“事有本末”为其重点和核心，“此‘格物’一解无不明，而《大学》全书亦无不明矣。”<sup>④</sup>，反对郑玄将格物与致知倒因为果的看法。逻辑方法是学者在读书治学方法论的体现。在具体运用上，顾实认为“考证群籍，原是读书人当家本领”，朴学的风格踏踏实实的做学问，在讲疏中经过考证后指出“某字原作某”，“某字当作某”，不以臆测，真正为字字有来历。在《论语讲疏》中，正文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亡也。’”顾实讲疏云：“此孔子之民族主义，文化主义，不与夷狄主中国也。……夏之造字，象有元首股肱之组织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此大同之诸夏也。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乱由此兴，兵由此作，此小康之诸夏也。”<sup>⑤</sup>又云：“夷之造字，……象有绳以系之，是东方引弓之民也。狄之造字，从犬从火会意，北族行猎而带犬，北方天寒而用火，象其俗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古人命名，皆肖其俗。但言夷狄者，行文之便，从省略也。”<sup>⑥</sup>从夷、狄、夏之本以讲起，由其本意而阐发其中义理，有理有据，其所征引载籍斑斑可考。总之在考证方面，顾实无论巨细都能进行比较合理的爬树剖析，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而后归于一宗。又认为“凡治学者，自己无心得，则见人书亦如盲目”，讲求读书不仅有法而且要有心得。人们历来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不同的理解。《毛序》认为：“《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状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郑笺》认为“哀”是“衷”字之误，但是哀窈窕仍然讲不通。朱熹注《论语》认为“哀”字太重，而改为“忧”。皮锡瑞认为《关雎》一诗为“陈古刺今”，“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此之谓乐而不淫”，“哀即哀周道，不伤谓婉而多讽，不伤激切，此之谓哀而不伤”，清代刘台拱认为应该“兼《关雎》之三而言之”，顾实也持这种观点，但立论与刘台拱不同，他认为：“今虽乐亡诗存，然犹可得而征也。古之乐章，皆三篇为一，《国语》曰：‘《文王》、《大明》、《绵》，两君相见之乐也。’故传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记曰：‘宵雅肆三，乡饮酒礼，工入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盖乐章之通例也。《论语》记孔子言《关雎》，本章之外，尚有《关雎》之乱者。”<sup>⑦</sup>顾实认为“后世但执《关雎》一诗以求之，岂可通哉？自当以《关雎》、《葛覃》、《卷耳》三诗兼言以明之，所谓文章皆三篇为一也。”<sup>⑧</sup>由此得出结论：“是以乐而不淫者，《关雎》、《葛覃》也；哀而不伤者，《卷耳》也。《关雎》，乐妃匹也；《葛覃》，乐得好职也；《卷耳》，哀远人也。”<sup>⑨</sup>此说明顺可通，不盲从前人。在《穆传讲疏》中凡一地名下，必先释今地所在，然后援引古今群籍，语不离宗，或数十字，或数千字，要言不烦。在《汉志讲疏》中援引诸家语为己所用，在对每一小序及每一书的解疏中，皆参稽众说，提出己见，将每一类书的学术源流，版本流传皆一一洞明。而且以。读后足见其文字音韵功底。

同时，顾实以敏锐的眼光看到当时为“国际化之历史”，认为“世界大势，东西文化之混合，不可掩之

① 《汉书艺文志讲疏自序》第4页。

② 《大学郑注讲疏自序》，《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三号第71页。

③ 同上第74页。

④ 同上73页。

⑤ 《论语讲疏》，《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二号第11页。

⑥ 《论语讲疏》，《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二号第11页。

⑦ 《论语讲疏》，《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三号第7页。

⑧ 同上。

⑨ 同上。

事实也”。他认为东方为“猎鸟主义”、“和平主义”，而亦“人道主义”；西方为“猎人主义”、“战争主义”，而亦“人权主义”。东方伦理先仁而后义，西方伦理先义而后仁，他进而分析产生如此差异的原因：

“东洋之德治主义，即承儒宗孔而来，盖上古中国以农立国，所重民食丧祭，而丧祭二事，足以节制生育，减杀人口，故地荒人稀，易行德治也。若西洋工商业繁盛，以都市为中心，则不得不用法治矣。”<sup>①</sup>他不仅思想上如此，而且将此思想贯输到他的治学上，使其著作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点，在《中庸郑注讲疏》章十二配天中讲道：“希腊初期哲学从事于自然界之探讨，中国则自伏羲画卦以来，从自然之外物，迫证于心。唐虞三代之圣哲更从内心而扩之于外物。”<sup>②</sup>这是顾实对中西人文的最基本的认识。他以中西不同的比较方法来阐发中国传统古籍中具有时代性和合理内核，使其更具有现实性。如在《论语·为政》中有：“子曰：‘道之以刑，齐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③</sup>讲疏曰：“大抵今所谓法治德治两派，即此政刑德礼两派也。德治在于普及教育，由小学教育普及，而中学教育普及，而大学教育普及也。法治在于立法司法行政人员，皆受高等法制教育，而无不合法也。道德法律二者，本如国家之有两轮，偏废而不能行，遍胜亦于国家不利。”<sup>④</sup>他希望通过这种讲疏方式，一方面实现对古典文化的义理阐发，揭示其传统内核，另一方面，则是时代性使然，即希望“得吾说而存之，庶几迅速恢复吾民族固有之精神哉”<sup>⑤</sup>。尤其明显的是顾实以中西历史人文的不同来审视《穆传》在上古史的价值，提出周穆王西征为最早的中国文化之西流与当时的“西学东渐”犹相似。

古来学者大致来说有两种类型，一为与现实政治共进退，关注现实；一种为远离政治，投身治学。前者如陈垣、顾颉刚、胡适等辈，后者如陈寅恪等。顾实即属前者。顾实十分关注国家命运和形势，曾经在民国五年（1916）参加革命军讨袁之役，自作诗《民五参加革军讨袁之役离潍县作》云：“此行踟躅孑身回，帝制长终付劫灰。忍治空劳姬日梦，图强不上越王台。孤云野鹤归田去，铁马金戈护国来。”<sup>⑥</sup>顾实的时代正值西学滚滚东来之际，况当时国运日堕，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军阀混战实质上是列强在华争夺既得利益的表现形式。顾实一方面感到中华文化传统之博大精深，赖以薪火相传；另一方面又痛感当时盲从西风之风尚，这其实是两种文化类型在相互撞击时如何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文化人，顾实力图通过文化的特有功能即从文化上和精神上拯救民族和文化，这尽管有些理想化，但这却表明了顾实爱国的拳拳之心。因此他在《穆传讲疏》中认为中华男女同胞“人手一编《穆天子传》，以激发其气，庶几今后吾民族将恢宏其本来活动之能力，以与世界共进于无穷之景运”<sup>⑦</sup>，又认为《穆传》“尤为吾东方民族中华民族复兴之殷鉴。”在顾实心中，和平相处是民族和文化以求共进的最好处理办法。因此，他申明曰：“吾中华民族将永抱其和平主义”，同时将《老子》所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应用于现实中，将中国传统哲学有了新的生命和继续存在的合理性。顾实不仅将以文化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在其《穆传讲疏》自序中反复申明，并且直接昭示其心，“故余书之作，将为我民族复兴也”。他在自序中，将穆天子所至之地、汉通西域诸事件一一叙明，证明中华民族为有伟大活动能力之民族，希望籍此以表明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治《墨子》一书中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抑且冀墨氏之学大昌，有以挽救祖国颓丧人心。”<sup>⑧</sup>这种文化人的爱国之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为当临西风东来时代的顾实，也同时具备了新时期学者的特点。即注重以地下材料与纸上之文献相勘比，注意利用新材料。其在《穆传讲疏》中专列“穆传出土后之校理”一目，不再拘泥于以前知见传本的信息，开始关注地下出土文献。在《穆传将疏》中，顾实利用新材料提出两个新的观点。一是《穆传》中缺文乃盗冢者烧之，非荀勖等不识古文而缺之。二是《穆传》乃周初简括肃穆之文字，非“殆不可读者”，此点从俗字、异字来讲，以出土文献对比之，纠正了西方以及中国某些人的错误看法，并对此书情况作出客观的评价，认为《穆传》若以多数之篇章而论，仍属大体实具。

### 三

顾实的文献学素养很高，甚得家法。在目录、版本、校勘等多个方面皆有相当造诣，并且将其融会到具体的读书治学上。

目录学为读书治学之门径，张之洞在《轩轾语·读书宜有门径》中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此确为切要之语，顾实在其著述中十分注重对目录的应用。他对《汉志》进行疏解便是希

① 《论语讲疏》，《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一号第29页。

② 《中庸郑注讲疏》，《国专月刊》1935年第二卷第三期第24页。

③ 十三经注疏本，第2461页。

④ 《论语讲疏》，《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一号第6页。

⑤ 《大学郑注讲疏自序》，《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三号第74页。

⑥ 《国专月刊》1937年第三卷第二号第63页。

⑦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自序第3页。

⑧ 《墨子辨经讲疏例言》，《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五号第7页。

望以目录书的讲疏实现对中国学术源头的把握。明学术源流,则可以对某种学术思想予以准确定位,益于读书治学。在对每一书的讲解时,顾实将每一部书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四库总目提要》分类部居及发展源流递相叙明,将目录学作为学术史来看待,充分发挥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汉志·六艺略》著录《楚汉春秋》九篇,顾实疏之曰:“亡。沈钦韩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览》引之,《经籍考》不载。’盖亡于南宋”<sup>①</sup>,此中无顾实之论,但其引用的材料使我们对其书的著录和流传有了大概的了解。如在《汉志》著录《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在讲疏中,他指出其书至《隋书·经籍志》亡《段嘉》十二篇,唐志又亡《灾异》六十六篇,历宋入明,而《汉志》之八十九卷仅存三卷。又“今辑《易传》、《易占》、《飞候》、《五星》、《风角》等篇,虽《京氏占候》不尽此,亦大端具矣。”<sup>②</sup>将每书的著录一一详明,使人了然于胸。同时对其著录年代、篇数,作者均有详细考证,证据凿凿,则以断语。通过这种图书目录探寻的方式,顾实将《汉志》所著录书的亡、存、残等情况一一展现,脉络清楚,给人以学术史的直感。在《穆传将疏》后又单列“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一目,分“列朝著录及刊本、抄本、校本”和“近代诸家注本和学说”二子目,以提要的形式列明。著录其书卷数、作者、注者、藏本、经史子集所居部次。其中藏本未见者,以“未见”注明。如其书著录《穆传》六卷,晋郭璞注,明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录杂史类,在提要中援引诸家题跋索引,参稽众说,开列善本与通行本,注明其书行款,并兼及辨误。若丛书本收入《穆传》,则在提要中对丛书予以简单介绍。

在对书籍的版本流传方面,顾实也竭尽全力进行详细考辨。在列出众家版本后,根据分析和考证指出善本和通行本,指出劣本。《汉志》著录《韩诗传》六卷,顾在疏证时,在介绍了其书的著录情况后,提出“汲古阁本尤多窜改”,同时又指出通行本,“近新安周霁原廷采有校注本,多所订正”,“赵怀玉亦有辑佚文,附本书(指《汉志讲疏》)后”。在其《穆传讲疏》自序中称:“《新校订本穆天子传》者,汇合明清众刻本抄本及众家校勘而成”,而且在例言中详言《穆传》的版本源流发展,使人知某为善本,某为通行本;知某本可读,知某本不可读,使人在版本选择上有了相应的储备。

“校勘古书,大不易事”。顾实既认识到了校勘的重要性,又认识到了校勘的艰苦性。顾实在《穆传讲疏》中“覆审众家校勘所引书,间有不合”,故则载明“某校某据字样”,同时其所引典籍皆注明,以备检稽。又认为“间有不合”的原因是由于“所见本不同”。校勘十分重要,若不通校勘,一字之别,差之千里。《穆传》卷一首行有“古文”二字,顾实认为荀勖等所加。因为在其书写成隶书的时候,古人一般标上“古文”二字,汉时诸人崇古文之风,因此认定此二字为后人所加。又王隐《晋书·束皙传》曰:“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今《晋书·束皙传》曰:“以今文写之”,由此知加“古文”二字为以古今对言之别。又,汉代作为六艺经传流传的《尚书》、《毛诗》、《左氏传》等都已改成隶书,而仍称之为古文,此为例证。其治《墨子》,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遍校明清两朝十余种刊本,历时十余年,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墨子》以道藏本为祖本,而翻刻之际,互有校改,又为之疏通证明。书后附《墨学书目考》。

辨伪之学,由来已久。顾实认为“凡辨古书之真伪,一年历,一地理。天地古今,道途方向,无一可以虚造者。”这种辨伪方法的实行体现了顾实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同时又具有科学性。其辨伪之法多融汇在目录提要及校勘中,兹不赘述。另,顾实有《重订古今伪书考》一书,必有大量辨伪心得,其为三十年代出版之物,山大图书馆未见,限于能力不可得而观之。待日后见之,必于此条多充实之论。

#### 参考文献:

- [1] 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一、二)[M]. 辞典馆 1937.1(复印本).
- [2]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M]. 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 [3]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M]. 民国丛书第三编.
- [4]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Academic Methods of Study and the Documents Achievement of Gu'shi

ZHU Xin-lin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Gu'shi pays attention to combine macroscopic and microcosmic, era and tradition together, applies them to his research and has made the admirable achievement. Also he emphasize the foundation knowledge of Documents.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se items preliminary.

**Key words:** Gu'shi; Academic Methods; Documents

① 《汉书艺文志讲疏》,第64页。

② 《汉书艺文志讲疏》,第17页。